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Revised Edition)

西方政治思想史

(修订版)

唐士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Revised Edition)

西方政治思想史

(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唐士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4170-0

I. 西… II. 唐… III. 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4480号

书 名: 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 唐士其 著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170-0/D·211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9.5印张 646千字

2002年5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2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修订版序言

本书修订版的出版,首先应该感谢读者的厚爱,其次应该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此次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调整了第四部分的结构,并且增加了对伯林、奥克肖特和哈贝马斯等人思想的介绍,从而使内容上显得更加完整。第二,对全书各章节进行了全面订正,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部分,同时也增加了若干我认为需要补充的内容;有些部分进行了改写或者重写,体现了我近几年新的研究成果;另外对一些基本的判断进行了反复推敲,力争使其进一步准确、完整。第三,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对于一些重要思想家,比如尼采、韦伯以及近来颇有影响的共同体主义者没有设专门的章节论述,但仍然采取插叙或者注释的方法,通过与其他思想家的对照介绍他们的相关理论,同时适当增加了思想家们之间相互批评的内容,以便读者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能够获得一种立体的印象。第四,尽可能克服了第一版中语言欧化的缺陷,使全书表述进一步简洁易懂。我自己并不认为深刻的思想只能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表达,相反,语言的佶屈聱口,往往体现了思想上的滞涩不畅。因此,语言的规范化,同时也是思想的规范化。深入浅出,既是对语言的最高境界,也是思想的最高境界。第五,对书中的大量引文进行了反复校对。引文的处理大致分三种不同情况。一是直接引用权威的、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中文翻译(主要是收入商务版“汉译世界名著”系列中的译作);二是我根据原文对出自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译本(比如新出版的《柏拉图全集》和《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引文进行了校改,但同时注出了该译本的对应页码,必要时说明我改译的理由,以便读者查对;三是我自己的翻译,其中有些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出版,有些是因为我有不同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翻译的基础是对原作的把握,而

对文本的把握本来就具有多种可能性,同时汉语的表达也存在多种可能的选择,所以我不同意其他译法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它们的价值。本书对引文的翻译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忠实原义,同时简明易懂,当然,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是否做到了,还要请各位读者判断。另外,为了控制本书已经比较庞大的篇幅,修订版删除了第一版原有的两个附录,原来长长的参考书目也略去了,因为文中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注释。

在方法论方面,本书摒弃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传统,强调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并非古代希腊思想自然的成长,而是不同文明因素相互借鉴、彼此融合的结果,这一点通过本书的结构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来。另一方面,虽然我认为思想史上的确存在一些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并且尊重施特劳斯学派的思想史研究在哲学层面的价值,但并不完全认同该学派那样一种厚古非今的思想史理解方式。总体上来说,我更倾向语境主义的立场,特别是波考克的语言学政治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对不同时空条件下政治语言的具体把握,既注重同一套概念与语汇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含义,也注重不同表达方式可能具有的相同内涵,从而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与更宽广的空间,并且使纵向和横向的思想比较变得更有意义。

作为中国人,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还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寻找一些可资参考借鉴的理论资源。由于中西政治实践与政治思考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两者之间的确表现出明显的区别。首先,中西方被纳入政治范畴的人类活动领域就各不相同,比如在中国通常以政治形式处理的某些价值问题,在西方则被宗教接手;而在中国通过宗族和血缘关系解决的个体的利益问题,在西方却被高度政治化。其次,政治领域的不同必然使关于政治的思考各不相同,实际上古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或者说中国人并不认为政治与一般性的社会事务有何根本区别,这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中国人对政治本身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深入探讨,但却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传统中沉淀下来的大量实践的政治智慧。

除了各种具体差异之外,我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中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思考中不存在的。第一个方面是普遍平衡的观念。这又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在狭义的政治与法律之间寻求平衡的传统(广义的政治应该包含法律在内),当然,由于政治始终处于主动的、变动中的态势,所以这种努力通常表现为对法治的追求;其次,西方人倾向于把政治理解为各种权力之间的平衡,因此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基本上不存在“定于一尊”这样的观念,当然,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实践

的反映。第二个方面是西方倾向于以法律和政治的方式保护个人利益,也就是使之上升为权利而获得某种相对的确定性。第三个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中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其极端表现就是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类事务进行简单划一的把握。特别是近代以来,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明显上升,甚至被人们认为代表了西方政治思想的精神实质。前两个方面是我们在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借鉴的内容,后一个方面则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和反思。实际上可以认为,西方思想史上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逻辑的理性主义与经验的理性主义,它们相互冲突、彼此平衡。虽然近代以来前者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但后者实际上仍然积淀在西方政治思维与政治实践的结构深处。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思想进行重新评价,也有可能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智慧进行不同的理解。

由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产生与西方政治学对应的思想体系,所以中国的政治智慧往往通过非政治的概念和语汇加以总结和表述。比如上面提到的西方政治思想中高度关注的权力平衡问题,在中国的政治论述中基本看不到。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却又能够通过诸如阴阳五行的理论领悟到其中的某些奥秘。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在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进行比较、在什么基础和层面上进行比较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从萧公权开始)已经参照西方政治思想史总结和编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是必要的第一步的工作,但必须尽快超越这一步,因为这种“按图索骥”的方法同时又肢解了传统的中国智慧。

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可能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但必须吸收西方各方面的思想成果。一种成功的吸收要求我们对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同时具有深入完整的理解,如此才能真正找到两者之间的相通与相异之处。这一工作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到今天,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特别是近代自由主义在对个人权利提供了相当完善的保护的同时,又严重地限制了政治的可能性。对此,西方思想家们也正在进行深入反思。政治既是人们追求自由的重要手段,也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工具;它既需要充分保护人们的平等、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同时又必须维护善与正义对社会的引导。自由主义恰恰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但是,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史学家雅内所质问的:“是否因为人们在道德上无法达到至善,就应该放任自流,放弃

道德上的追求?”^①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动物,在共同生活中不可能真的置是非善恶这些根本问题于不顾。

与西方思想相比,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高度道德化的,或者说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的是一种有道德的政治,至少这是先秦儒家的最高理想。有道德的政治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把道德作为控制民众的工具,它首先要求统治者追求道德的完善、接受道德的约束。当然,道德如果仅仅体现为一种观念,那么最终会蜕变为权力的侍从,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化为我们提供的教训。但如果政治失去道德的支撑,那么最终只能堕落为赤裸裸的暴力。如何实现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与平衡,这是 21 世纪政治思想面临的一个根本课题。也许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传统思想能够有所贡献。

最后还是要对我国内外的师友与同事们表示深深的感激之情,虽然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与他们的交往、特别是思想上的交流,让我备感压力,但也获得自信,而且让我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人类的思想与感情是相通的。还要感激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师友们的鼓励特别是批评,尤其是中央翻译局的殷叙彝先生,他以 80 岁高龄,仍然为我指出了原书中存在的若干错漏之处。这次修订中,我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批评和建议,但不足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我期待着读者诸君的进一步教正。

唐士其

2008 年 2 月 26 日

^① Paul Janet,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morale*, Tome I, 5e édition,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p. lxxviii.

目 录

绪论 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1
一、西方政治思想概貌及其发展阶段	1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	17
三、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以及对政治思想史的解释	35

第一部分 古代希腊的政治思想

第一章 理性的政治	47
一、古代希腊文明与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	48
二、习俗、自然与理性	55
三、理想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	63
第二章 城邦的性质与目的	76
一、公民与城邦	77
二、秩序、正义与平等	86
三、城邦之后的政治与人	95
第三章 政体及其更迭	102
一、政体的划分	103
二、政体的更替	109
三、混合政体与法治	113

第二部分 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 世界秩序之下的法律	125
一、法律与公民权利	126
二、降临于尘世的自然法	131
第五章 精神的权力与世俗的权力	140
一、上帝之城与尘世帝国	141
二、教会对国家权力的侵蚀	148
三、向国家的回归	156
四、对暴政的抵抗	164

第三部分 近代西方政治思想

第六章 国民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73
一、君主与国家	174
二、主权、“利维坦”和专制主义	184
三、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以及近代政治学的诞生	197
第七章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207
一、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	208
二、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	218
三、自由的政治意义	228
第八章 权力受到制约的政府	241
一、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242
二、有限政府的理论	248
三、分权学说及其制度设计	254
第九章 平等、民主和自由	266
一、“人人生而平等”	267

二、民主的可能性	273
三、民主与自由	287
第十章 政治中的理性以及对理性政治的反叛	298
一、保守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理论	299
二、理性、历史与国家	313
三、法西斯主义	328
第十一章 社会改良、社会批判与社会运动	343
一、社会改良主义	344
二、“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	356
三、马克思主义	367
 第四部分 20 世纪西方政治思想	
第十二章 理性、政治与自由	385
一、政治中的理性与经验	387
二、“得过且过”的自由	414
三、理性、自主与团结	433
第十三章 政治中的权利与正义	468
一、自由社会中的正义	469
二、自由至上论	492
第十四章 民主政治的理念与现实	508
一、多元主义与现代民主的社会基础	509
二、谁在统治：精英主义对现代民主制的批评	520
第十五章 批判的政治思想	530
一、社会民主主义	530
二、女性主义	543
三、环境保护主义和绿色运动	555

第五部分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及其方法

第十六章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起点及其早期发展	
——对“伟大传统”的发现	571
第十七章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政治哲学的复兴	579
第十八章 “语境主义”与“语言学政治学”	610
后记	623

绪论

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一、西方政治思想概貌及其发展阶段

从地域或者外延意义上说,西方政治思想主要指西欧和北美的政治思想,因为自远古以来,在这一地域范围内,人们关于政治的思考就一直表现出某种可以识别的一致性与继承性,从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对政治的理解形成明显区别,并且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维体系。^①

至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亦即人们对政治生活各要素的理解和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与特点,由此导致政治的概念本身在时间进程中不断变化,而政治思想也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在古希腊,政治与作为基本政治单元的城邦即城市国家完全是同一个概念(πολις)。这意味着此时政治活动不仅尚未从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中被明确区分出来,而且作为公民基本的价值追求非常自然地延伸到了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诸如公与私、国家与社会这些后世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范畴也就根本不可能进入人们的思考。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也可以被理解为“城邦学”,因为它考察了构成一个良好的城邦所需要的几乎

^① 某些思想史研究者如 Quentin Skinner 对此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尽管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的确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与比如说东方的政治思想相比,其内在的继承性与一致性却是无法否认的。

所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基本条件。

古希腊这种“泛政治”的观念到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家领土范围的明显扩大使古希腊那种全民(实际上是全体公民,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和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参与政治的体制已经变得根本不可能,当时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手段也决定了公民个人生活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疏远——在罗马做出的决定必须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被帝国边远地区的人们所知晓的情况下,完全没有理由要求公民们把政治活动作为其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作为这一重大变化的结果,罗马帝国治下的公民已经完全不可能像古代希腊人一样,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获得人格的完善。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①但在罗马帝国,这样一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显然已经不再适用。就此而言,如果说古希腊时期,道德哲学只能作为政治思考的一项主要内容而存在的话,那么在城邦之后,人们就不得不到政治之外寻找安身立命的伦理依据。正因此,斯多葛学派那种崇尚自然的理论才会在罗马帝国早期知识分子当中普遍流行,而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②对灵魂完善的关注也才会更胜于对国务的管理。

罗马帝国时期哲学与政治的分离,及其所带来的人们在思想上某种程度的空白(毕竟不能让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民众依靠哲学生活),为基督教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流行提供了非常适宜的精神土壤;而基督教的普遍传播,以及教会组织在各地的建立,又对帝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带来了进一步的影响。基督教,特别是在其产生之初,对世俗政治权力就采取了一种疏远乃至对立的态度,认为两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形态是相安无事,各司其责——“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当然两者实际上的关系往往是时而合作,时而斗争)。如此一来,一方面有关人类精神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的职能范围中独立出来,古希腊意义上的政治概

①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IX卷,颜一、秦典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原有吴寿彭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以下简称“吴译本”),这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版本,可惜语言稍显晦涩。本书基本采用苗力田主编的中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必要时参照吴译本说明。

② 奥勒留从161年开始统治罗马直至他去世为止,著有《沉思录》(*Meditations*)一书。

念明显萎缩;另一方面,教会作为一种事实上的世俗权力的存在^①,以及它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又为政治生活增添了许多原来所没有的内容。这一切,对以后西方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西方政治演变的方向。

进入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西方的政治观念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近代政治思想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个人利益的优先性,即使对像霍布斯那样被视为专制主义者的思想家来说同样也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在个人利益基础上展开的政治学说,经洛克的系统阐发之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逐步成为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正统理念,它描述并且规范着西方的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甚至已经获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在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利益时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什么障碍的话,那么它只可能来自政府的专制权力,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国家需要做的只是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保障个人的所得,即承担一位“守夜人”的角色。不仅如此,由于自由主义者普遍相信国家自然地具有某种侵害个人利益的倾向,所以他们反复强调,必须通过种种方式对国家的行动能力加以限制。换言之,在自由主义看来,国家不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

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的话来说,自由主义追求的是“最小限度的国家”,与之对应的当然就是“最小限度的政治”,即其范围受到极度压缩的政治空间。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国家与市民社会、公与私的界限得到明确区分,政治仅仅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极小部分。也可以说,自近代以来,政治的概念进入了西方思想史上其内涵最小的时期。^②虽然与洛克的时代相比,现代西方国家的活动领域已经明显扩大,但政治观念以及国家职能的任何一次哪怕是很小的拓展,都必须经过大量的理论论争、甚至实际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

① 基督教会严格的教阶制度使其具有明显的行政组织特征,上级教会对下级教会及教众的命令类似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命令。特别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基督教会在精神和世俗意义都成为替代帝国维系整个欧洲统一性的权力结构。后来教会又拥有了自己的地产乃至军队,教会的法律在欧洲范围内通行。更重要的是,教会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在各世俗权力中心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切都表明,基督教会事实上掌握着不可忽视的世俗权力。正因此,教会与封建君主之间的权力之争成为中世纪后期西欧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②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事实上,即使在这一阶段,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对政治的理解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比如在近代德国,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就要比英美等国宽泛得多。

以上只是对西方思想史上政治范畴演变过程的一个非常抽象和概括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一演变虽然是在一个大致确定的传统之内发生的,但与此同时它又的确表现出某种阶段性的断裂。如何理解这种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就涉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一历史是否具有其整体性。对此,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在早期的思想史研究者们眼中,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后代的政治思想相应地被认为是古代希腊思想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这种观点类似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据此,古希腊以后西方政治思想的全部发展在本质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而只不过是古代思想要素的逐步展开。这就如同一粒橡树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而大树的全部特质都能在当初的树籽中找到。这种思想史观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神秘化理解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一种西方思想优越性的偏见。

应该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确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这种完整性并非出于“天定”,而是西方历史独特发展过程的产物,是古代希腊思想与古罗马和基督教思想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政治和法律传统渐次融合逐步形成的。事实上,在几次大的融合过程中,承载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主体人群的构成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具体体现为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并且接受了基督教观念;日耳曼人又吸收了罗马人的政治思想和基督教的观念并且将其与自身的传统相结合,最终奠定了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因而从根本上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乃是不同文化因素相互叠加、不同民族相互融合的结果,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今天的西方政治思想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承古希腊文明之后,古罗马和基督教思想以及日耳曼传统的影响,是导致上述西方思想传统中政治范畴发生变化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把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划分为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以及近现代的政治思想。

古代希腊人为后世的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即思维工具和基本的思想素材,特别是关于政体类型问题的思考,以及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古代希腊文明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根本性影响,就是决定了至今为止这一思想体系把握政治问题的基本模式。一般认为,古希腊有系统的政治思想起始于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之所以享有这一殊荣,则是因为他开始把希腊哲人对自然的兴趣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状态的研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只涉及研究对象,至于希腊人探究自然现象时

采用的思想方法,即理性的方法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苏格拉底的目标,恰恰是希望把自然哲学的逻辑和方法引入社会生活领域,并且找到在人类精神世界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

理性的思想方法乃是古希腊文明最突出的精神特质。它首先不允许在思维过程中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形,因而也就是一种严密的逻辑(形式逻辑)思考的方法。^①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正是依据这一基本方法对整个世界的起源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推论,即使在那些具有明显辩证倾向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等人当中,对矛盾的拒斥也是一个基本的思想特征。^② 当然,相信能够通过严密的逻辑思考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准确知识,从根本上说首先必须假定整体世界本身的“合逻辑性”,即具体思维对象的“同一性”(identity)与整个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在此基础之上,理性思考的内容则体现为对事物或者现象之后某种不变因素的探求,因为后者被认为是某一事物能够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并且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关键,是事物的灵魂,柏拉图称之为“相”^③,亚里士多德则称之为“形式因”。这种“相”或者“形式因”体现于物质性的存在便构成了它们的本质,体现于事物的进程便成为支配它们运动的确定不移的法则。^④ 严格依从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当然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特征,即僵化、脱离实际与不善变通等,但它另一方面却也能使思想者直达事物的基本规定性,为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世界提供一种简单而清晰的解释。

理性的思想方法同样支配着古希腊人的政治思考,并且在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中得到了充分而出色的运用。“辩证法”类似一般逻辑论证中的“归

① 在这里体现出希腊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对矛盾的排除并非有效思想的必要前提。相反,中国人认为,矛盾既然客观地存在于世界的各个方面,因而也只会有一种能够容纳矛盾的思维才可能是有效的思维。阴阳五行学说可能最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的这一特性。

② 比如说,有的哲学家认为,世界从根本上说是静止的。其推论过程是,神创造的世界应该是完美的,而某一运动中的事物,不是向更完美、就是向不完美运动。不论如何,只要这种运动存在,便可以证明世界在总体上说并不完美。由此可以推断,世界是静止的。

③ 柏拉图的 theory of the idea,中国学术界传统上一直称为“理念论”,但最近以来,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用“理念”来翻译 idea 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应该改译为“相论”,本书同意并且采用了这一译法。

④ 这种思考在哲学上被称为“存在论”或者“是论”,试图解决的是某一事物如何是该事物、或者说一事物为何是此事物而非彼事物的问题。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巴门尼德,他曾经指出:“只有哪些研究途径是可以设想的。一条是:它是,它不能不是。这是说服的途径,因为它通向真理。另一条是:它不是,它必定不是。这条路,我告诉你,是完全走不通的。因为不是者是你不认识也说不出的”(D4, KR344,译文引自王太庆:“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载《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79页)。

谬法”和“反证法”的结合。它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不同观点持有者的对话揭示某种观点中存在的逻辑矛盾,并且通过对话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最终达到能够被参与者共同接受的正确结论。与抽象的逻辑推演相比,“辩证法”的优点是直观形象,完全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化的实践或者常识性的观念出发,生动有趣,易于接受,因此用这种对话体写成的柏拉图的主要著作,不仅为后人留下了深邃的思想,而且也成为宝贵的文学遗产。

严格的逻辑思维为后世的政治思想家所继承,甚至基督教思想家们也概莫能外^①,虽然他们一般不再使用“辩证法”。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対自然的类比和对人事的推演得出各种政治结论的话,那么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强调从某种假定的(或者认为不受置疑的即自明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论证得出秩序与义务、权利、平等与自由等一系列政治范畴,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各种严密的理论体系。

理性主义的思想方式与自然法理论这一希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之间,体现为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从希腊文明早期开始,人们就普遍认为,与自然界一样,在政治生活中也应该存在一些恒久不变、而且彼此之间相互融贯的基本法则,他们把这种法则称为“nomos”,并且视之为政治思考的终极对象。^②当然,类似自然法的观念并不为古代希腊世界所独有,比如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存在“天道”、“天理”之类与人间的实际政治秩序相对的范畴。希腊思想中自然法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理性主义的产物^③,并且始终与之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文明中,自然法则却往往被人们作为神秘体现的对象。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相信,政治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也具有自身的本质与规律。这种规律被他们称为“自然”,它可以通过理性的探索为人所理解。这样,理性事实上就成为“自然”的另一种称谓。就此而言,“自然法”不过意味着政治世界中某些被理性思考发现的基本法则。^④在古希腊政治思

① 在基督教思想中,即便是上帝也必须遵循逻辑规则。

② 在不同的场合,现代人也将这个词翻译为“规律”、“法律”等等,柏拉图晚年的重要著作《法律篇》提到法律时用的就是这个概念。

③ 从逻辑上说,对自然法的坚定信念是理性主义的基础,因为如上所述,如果不预先确信存在某些确定不变、并且相互谐调的自然法则的话,那么严格的逻辑性在思考人与自然方面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④ “自然”与“自然法”两个概念在用法上还是有些不同。在古希腊的政治著作中,前者出现的频率要远高于后者,亚里士多德更是到了几乎言必称“自然”的程度。“自然法”的概念主要是通过斯多葛学派,特别是古罗马的一些政治思想家,如西塞罗等人的阐发而开始广为流传的。不过,从其基本含义来看,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太大的差别。